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 一 二 七 次 会 议

2000 年 4 月 14 日 星 期 五 ， 上 午 10 时

纽 约

| | | | |
|-----|---------------|-------|-------------|
| 主席: | 阿克斯沃西先生 | | (加拿大) |
| 成员: | 阿根廷 | | 利斯特雷先生 |
| | 孟加拉国 | | 阿赫迈德先生 |
| | 中国 | | 王英凡先生 |
| | 法国 | | 莱维特先生 |
| | 牙买加 | | 达兰特女士 |
| | 马来西亚 | | 卡迈尔先生 |
| | 马里 | | 乌瓦纳先生 |
| | 纳米比亚 | | 安贾巴先生 |
| | 荷兰 | | 范瓦尔苏姆先生 |
| | 俄罗斯联邦 | | 格兰诺夫斯基先生 |
| | 突尼斯 | | 贾兰迪先生 |
| | 乌克兰 | | 古今斯基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
| | 美利坚合众国 | | 霍尔布鲁克先生 |

议程通过

卢旺达局势

1999 年 12 月 15 日 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99/1257)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上午 10 时 25 分开会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想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卢旺达代表的信, 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 并征得安理会同意, 我建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位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穆塔博巴先生 (卢旺达) 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根据在安理会此前的磋商中达成的谅解, 如果没有人反对, 我就认为, 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其暂定义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期间联合国行动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英瓦尔·卡尔松先生参加会议。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我请卡尔松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在此前的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 S/1999/1257, 其中载有 1999 年 12 月 15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 转交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期间联合国行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我想赞扬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同意下授权进行独立调查。

在这方面, 我想回顾, 秘书长在收到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后在 1999 年 12 月 16 日发表的一个声明中说, 他完全接收其结论。在那个声明中, 他还欢迎调查对从那个悲剧中吸取教训的强调以及调查所提出的认真的和论据充分的建议。他指出, 这些建议旨在确保联合国在今后能够并将会采取行动以防止和阻止任何此类悲剧。

在这个会议上, 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卡尔松先生的情况介绍。我想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对卡尔松先生和

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汉教授和库波拉蒂将军出色地履行交给他们的重要责任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现在请卡尔松先生发言。

卡尔松先生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有机会提出独立调查委员会对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期间联合国行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我感到满意的是, 将在安全理事会中对该报告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而安全理事会是收受这些报告的主要机构之一。我赞扬加拿大发起举行这个会议。

自从卢旺达种族灭绝开始以来到现在已经 6 年了; 自从几十万男女和儿童在仅仅 100 个恐怖的日子里被他们自己的同胞残酷屠杀以来已经 6 年了。这场种族灭绝是在国际社会面前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面前发生的。在这些屠杀开始的时候我们国际社会没有阻止、也没有制止这些屠杀。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未能那样做。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 却未采取行动。

今天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问题是为什么和能做什么以使 1994 年在卢旺达所发生的事情决不再次发生。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根据秘书长的倡议、在安全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设立的。我的另两位同事是大韩民国的韩升洲先生和尼日利亚的鲁弗斯·莫杜普·库波拉蒂中将。我们负有两项主要任务: 确定种族屠杀期间同联合国的作用有关的事实并对未来提出建议。我们走访了卢旺达和大湖地区其他国家。我们对纽约进行了好几次访问, 并同联合国主要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会见。我们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和美国。我们同种族灭绝的若干幸存者、被杀害的 10 名比利时维持和平人员的家属、当时在卢旺达的联合国当地工作人员一些成员和其他目击者进行了谈话。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对所发生情况的必要而痛苦的了解。

去年 12 月 15 日我和我的同事将我们的报告提交给秘书长。在报告中, 我们指出了我们认为联合国在

种族灭绝发生以前和发生期间的失误之处，并对未来提出了 14 条建议。

今天我要着重谈一下调查团的主要结论，尤其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报告向前看的因素，即报告所提的建议。安理会有力量防止在卢旺达所犯的一些错误再次发生，我希望今天的讨论将有助于调动在这方面的意愿。

调查团发现联合国的最大的失败在于缺乏资源和缺乏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往往被称作孤儿行动，它是在索马里灾祸之后才被允许建立的。它比所需的小而弱，其任务是基于当时对卢旺达和平进程过于乐观的评估之上的。在种族灭绝开始的时候，援助团不能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行动运作。正如我们在报告中所写，缺乏政治领导、缺乏军事能力、严重的指挥和控制问题以及缺乏协调和纪律。

在报告中，我们努力指明其责任在于联合国系统内的每一个具体事例。在种族灭绝开始的时候，联合国在卢旺达有一支具有 2 500 人员的维持和平行动。他们本来应该能够防止或至少限制种族灭绝。然而实际上除了在卢旺达的一些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勇敢努力之外，部队四分五裂了。在卢旺达留下的联卢援助团人员的确有英勇行为。在卢旺达国内外有些人活下来应该归功于联合国，但是在联合国撤离卢旺达的时候，也有人被遗弃了。这些人中的一些人遭到屠杀，其他的人则有被杀害的危险。援助团大部分人员的撤出使卢旺达深感怨恨。

我还应该说，我们的报告也包含了对联卢援助团和在卢旺达的一些部队的批评。同样重要的是也要说，未向卢旺达派出部队或提供物资的那些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也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可怕的事实是，联卢援助团从未能在数量上或在能力上得到它所需要的部队。

调查团强调，国际社会必须作好准备能够对种族灭绝的局势予以指认，并采取相应行动。在这里，关

键是政治意愿，缺乏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可能是对联合国为实现和平和维持和平所作努力的最危险的障碍，并破坏联合国本身的权威和合法性。在种族灭绝期间联合国所起作用在卢旺达造成最大怨恨的一个方面是在种族灭绝开始以后的几星期内，安理会就决定将联卢援助团的兵力削减为原来人员的约十分之一。这项决定以及缺乏对极端分子的行动作出坚决反应的意愿使卢旺达平民和剩下的联合国人员处于风险之中。面对一场种族灭绝的证据、尽管对于正在卢旺达发生的恐怖情况有着明确证据，却作出了这项决定。

我们报告的一项关键建议强调必须改进联合国在维持和平领域的的能力。本调查团成员并非这样说的第一人，不幸的是，我们也不见得是最后这样说的人。但是我谨请安全理事会成员认真考虑这一点。联合国仍然是能使维持和平具有全球合法性的唯一组织。这一情况的反面是，维持和平努力的失败造成对本组织信誉的摧毁性破坏。我谨对安全理事会成员说，给予维持和平行动所需的任务。注意使所提供的资源同其任务相符。在短时间内调动提供联合国的所需部队政治意愿，并显示为国际法、和平与安全履行职责的同样决心，而不论危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大洲发生。

对秘书长，我要说继续将注意力集中于改进秘书处计划和准备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在建议维持和平行动时告诉安全理事会实地的真正需求是什么、要多少部队、任务是什么、任务如何棘手。然后安理会有责任不要让短期预算和其他财政考虑否定这些需求。它必须确保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之间在实地的充分协作，并利用从先前各个行动中所汲取的教训。

我希望被任命跟踪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报告的小组将帮助指明这些教训。真正的挑战是在对维持和平行动作出每日规划的时候汲取这些教训。

最后，关于这一点，我谨希望所有会员国将利用千年首脑会议和大会创造势头以处理联合国维持和平所面对的各种问题。会员国将有机会看到使维持和

平行之有效在政治上的必要性，并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维持和平努力的各个问题。

在灭绝种族前的几个月，联合国而且还有会员国和非政府角色未能真正认识到有人在策划着有系统的恐怖暴行。存在着一些事发前的征兆，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注意力大多集中在达赖电报的命运，在我们的报告中详细讨论了这一点。我想主要的教训如下：显然应与整个安全理事会分享这么重要的信息和有关威胁要灭绝一国人口的任何信息，并应导致作出坚决的反应。

过去几年中曾作出努力改善联合国预警能力。这次调查认为这些努力必须继续下去。一个关键的方面是改善秘书处中各有关部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关于改善向安全理事会的信息流动。这也取决于安理会成员从最有资格进行情况介绍的那些官员那里得到情况介绍，不管他是秘书长特别代表还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有关人权局势的信息往往是事发前征兆的主要指标。卢旺达便是如此。

关于必须改进我们预防能力已经说的很多。从卢旺达接受教训是个把预防付诸实践、把行动的意愿同行动的能力相结合的问题。改善对平民的保护是联合国的一项关键任务。这次调查建议维和行动的授权应酌情明确包括保护平民。我十分欢迎在安理会内根据秘书长去年报告就改善保护平民所做的工作。我希望强调这一专题会增加在具体冲突中处理这些问题的势头。

在这方面我想提及从卢旺达得到的两条教训。第一，面临灭绝种族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威胁时无中立可言。联合国及其维和人员必须作出反应。第二，应承认联合国特派团的驻留，不管其授权是否包括保护平民，将在平民中造成他们将得到联合国保护的期望。在规划行动时这一点应予考虑，但在讨论如何执行授权时也应考虑。

国际社会在卢旺达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我们必须做出坚决努力使同样情况不会重演。防止灭绝种族是一个责任；它也是一项超出人们通常对预防的理解的努力。因此这次调查建议秘书长开始一项联合国具体行动计划以防止灭绝种族。这个想法是要使联合国系统的每一个部分研究它应在其授权之内采取什么具体行动以便为防止灭绝种族作更好的准备。政治分析人员、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官员应该都受到培训以识别事发前的征兆。总部应有发现早期警报的准备并将其变为及早行动。这次调查的希望是这一类的联合国行动计划会对明年的反对种族主义世界大会提供具体的投入。

最后，我要表示希望这一报告将有助于改善卢旺达和联合国之间的关系。我也希望以后在讨论联合国在冲突局势中的作用时将考虑这些建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卡尔松先生十分全面和重要的情况介绍。

范瓦尔絮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独立调查团成员——卡尔松先生、韩升渊先生和库波拉蒂将军——提出通常所谓的卡尔松报告，并赞赏秘书长采取主动成立这一调查委员会。

我们对这次辩论贡献的目标是向安理会谈谈我们在阅读卡尔松报告时的若干想法。这些想法有些可能同我们目前在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工作有关。我们并不预期会在这次会议中得到答案。召开一次安理会公开会议也许是说明问题的恰当论坛；要找到答案将需要有更多时间进行认真研究。我们希望今天无法回答的所有问题将由以布拉希米先生为主席的小组处理，该小组已被要求对联合国和平行动进行一次重大的研究。

卢旺达报告提醒我们，还有一份斯雷布雷尼察报告，这两份报告都同目前的分析有关。由于明显的原因，我国代表团深知这一点，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还提醒我们，不准备向卢旺达派送任何军队和物资

的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也有责任。当然，对斯雷布雷尼察也可以这么说。因此，我们不是批评任何人，而是在开始时赞扬加纳和突尼斯，它们让它们的军队在灭绝种族的可怕几个星期中留在卢旺达，尽管其他国家的部队已经撤出。

其次，我们想就可行性问题谈几点看法。报告提出了它所谓的“自然问题”：在使卢旺达和布隆迪总统丧生的飞机失事之后最初几个小时，一支为数2500人的军队为什么无法制止民兵和卢旺达政府的士兵开始设立路障和杀害政治家和图西人。如果我们向自己提出以下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中肯：如果达赖尔准将1月11日的电报得到正确处理的话，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认为简单的回答说拟议中的行动显然会超出根据第872（1993）号决议交付给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的授权并不是正确的处理办法。诚然，卢旺达在安理会的成员资格使问题复杂化，但是我们感到应不加拖延地通知安理会其他成员。当然保护提供信息者的必要性要求高度机密。但是如果秘书处主要关心此事，它通知14位常驻代表比通知哈比亚里马纳主席更为安全。

我们想说，可行性取决于时机。在某一天可行的行动一个月之后未必可行。一旦失去机会之窗，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往往同日益减少的进行干预的政治意愿成反比。我们无意责备谁，因为就在维和领域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而言，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玻璃房子里。此外，关于时机，达赖尔1月11日的电报决不是第一个事发前的征兆。

1992年3月9日意大利非神职修女托尼亚·洛卡泰利通过无线电向国际媒介报警，成功地阻止了在尼亚马塔对图西人的一场有系统的屠杀，但随后他自己却惨遭杀害时，国际社会反应如何？最初产生的愤慨不久再次消失，因为人们认为在卢旺达杀人已经司空见怪，最好带一点不偏不倚的态度看待，不要太动感情。图西人在政府控制地区面临危险，胡图人在卢旺达受国阵线（卢爱阵）控制地区也面临生命危险。1993

年8月4日，《阿鲁沙和平协定》使我们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可以支持的和平进程，可以完美地表现他的不偏不倚。

一个星期后，几乎无人注意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瓦利·巴克雷·恩迪阿耶先生有关法外、草率或者任意处决的报告，原因可能就在于此。恩迪阿耶先生报告有如此众多的图西人被杀，他不禁要问这里是否可用“种族灭绝”一词。国际社会刚才寄希望于《阿鲁沙和平协定》，所以不立即欢迎这样一份报告，原因是明显的。但令人不安的是，事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种族灭绝已经开始之后，许多有关方面继续强调危害《阿鲁沙和平协定》的危险，好象这份协定比正在被杀害的成千上万人来得更加宝贵。1994年4月15日，在临时政府就职并且已经逃离基加利之后，安全理事会主席向报界发表声明，其中不提正在发生的大屠杀，反而重申《阿鲁沙和平协定》是解决卢旺达冲突的唯一可行架构。因此，安理会要求各方同意立即停火，返回谈判桌旁。

根据人权监察站的一份估计，在这份声明发表时，杀人者正在最疯狂地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有时一两天内就杀害数百，甚至数千人。安理会如此脱离现实的状况显然不能持久。4月28日，尼日利亚大使甘巴里批评对停火谈判重视过多，对大屠杀注意太少。两天后，4月30日，安理会发表一份主席声明，第一次承认已发生有平民被杀，尤其是在卢旺达临时政府成员或支持者控制地区。然而，即使在这一声明中也看不到“种族灭绝”一词。

我们认为，可以从这份报告中汲取若干教训。第一，我们不能把和平进程放在有关国家人民之上。第二，在一项和平进程已经不再有意义时，我们不能再死死抱住这一进程。和平进程可能已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视的是冲突。第三，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其次或许是对该地区有经验的国家。大多非政府组织从实地得到大量的最新消息。在此基础上，他们往往以吸引的办法和开明的态

度处理问题，不太可能把杀人者错误地当作受害者。第四，在发生种族灭绝时，不偏不倚不是一种美德。

报告指出，联合国的信誉要求部队派遣国避免单方面把部队撤出一项和平行动，如果这样撤军预期可能危害这一行动。但不幸可以理解的是，当某一部队派遣国承受重大伤亡时，它必然会受到来自本国议会和媒体的压力，要求撤出该国特遣队。这种反映的可能性越大，这样一个国家的特遣队反对这一和平行动方面攻击对象的可能性也越大。我们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但它就民主国家是否适合和平行动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记得在塞拉利昂问题上，尼日利亚在恢复民主统治之后，突然发现它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监测组（西非监测组）中发挥领头作用比以前困难。

我们已经谈到那个使事情复杂化的因素，即在种族灭绝期间，卢旺达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报告建议进一步研究在类似情况下暂停一个成员国的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可能性。我们不反对进行这种研究，但是我们认为，要确定可以作为这种暂停的事件的性质和规模是困难的。而且不管安全理事会成员资格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会员国普遍不愿意承认，在某一国家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态时，特别是在它们已经引起武装叛乱的情况下，该国政府可能上错的。我们认为，不愿意谴责卢旺达临时政府正在进行种族灭绝，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安理会的席位。

关于临时政府成员个人的作用，报告提出了当时他们是否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对塞拉利昂局势有直接“汲取教训”的意义。我们能相信该国境内作用者都充分认识到，《洛美协定》中的大赦规定不适用协定签字后犯下的践踏人权行为，而且他们对没有加入协定的各方没有约束力？

同样，在汲取教训方面，我们要指出，报告简单地谈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起因，这一问题理所当然地立在安理会议程最重要位置上。绿松石行动中走出人道主义保护区的问题被描述为近年来最复杂

最敏感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之一的开端。大量卢旺达难民涌入扎伊尔，使那里的难民营被帮派民兵和从事种族灭绝的其他力量所渗透。

这方面，我们要简单的谈谈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同意联合国应该承认它的责任，它没有尽力防止或阻止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我们满怀敬意地注意到比利时首相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开始六周年时所作的发言。当然，比利时不是唯一没有尽职的国家。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承认其责任。但今天这样做最好办法就是理解卢旺达正当的安全关切。

同样，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这一建议，即国际社会应该支持在种族灭绝后重建卢旺达社会的努力，特别重视重建、和解和尊重人权的需要。

我们也同意认为，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来防止今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所发生的那类灾难。我们支持加强预警和早期反应能力的建议。然而，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认识到，尽管对总部、各机构和各计划署工作人员以及外地特派团人员进行了各种培训，但是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人们可能再次期望联合国和平行动为他们提供一种保护，而其程度是该行动所无法达到的。

我们不应忘记，这就是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通常发生的情况。无论我们如何加强我们任务的力度，也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向人们解释其面临的各种严格的限制，但是我们绝无可能保证恐慌中的平民不会强行进入联合国和平行动的驻地，然后要求提供超出和平行动合法授权或实际能力的保护。此种情况可能再次导致一场人道主义悲剧。我们不希望造成这样的一种印象，好象我们已经找到办法，可以确保此类事情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有关卢旺达的报告非常尖锐地描述了联合国人员的驻留所引起的不现实的期望，例如在政府技术学校寻求庇护的人们中间就是如此。斯雷布雷尼察悲剧的实质与此相类似。可以说，这是卜拉希米小组需要研究的最重要问题，因为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就

会危害整个和平行动概念。因此,它必须得到解决。莫名的冲动是一种极坏的驱动力,但解决的办法不能是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库欣斯基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我们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卡尔松先生的发言。我要表示我由衷赞赏他以及参与独立调查工作的其他成员在研究和分析六年前所发生悲剧事件的过程中所做的非常出色工作。该报告及其所载各项结论和建议对于整个联合国,尤其是对安全理事会履行其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任务的工作的确是一个突出的贡献。

我们还要赞扬加拿大代表团召集举行公开情况介绍会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希望,我们对联合国、各会员国和官员以及事件的参与者所采取步骤和行动的深入分析将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正确解释和接受。对联合国的失败、过失和错误进行坦诚的讨论——对我们自身进行反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和加强联合国的信誉。

我要强调另一个要点。这份报告直截了当地描述了各种事件,点出了具体名字,提到了具体的行动和决定。我们当然应该称赞秘书长任命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需要秘书长和秘书处的极大勇气和自我批评精神。他们愿意承担自身应负的责任并接受严厉而公正的批评,这无疑值得尊重。

这份报告也对提高联合国的公开性、透明度和民主性作出了宝贵贡献,这样说没有错。任命独立调查组以及其后公布调查报告对于我们所有人,首先对于安全理事会来说,也是一个经验教训和一个警讯。它证明,任何步骤和决定——或者不采取步骤或不作决定的做法——都瞒不过子孙后代。

对乌克兰来说,种族灭绝不仅仅只是一个词。在我国历史上,我们曾经历艰难时期:光是在本世纪我们就曾经历过一场苦不堪言的悲剧。在这场悲剧中,一场精心策划的饥荒两年之内夺去了700多万人的生命。这些事件发生在曾经号称欧洲粮仓的国家里。今

天的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可以代表我国,向遭受致命的灭绝种族机器之害的卢旺达人民表达深切的慰问。这场悲剧给该国的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在这两种情况中,国际社会都意识到了各种事态发展,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防止或最终制止这场悲剧。因此,我完全赞成卡尔松先生所表示的意见:不应让政治、组织或财政上的任何考虑阻止国际社会以及阻止安全理事会代表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而不妥协的措施来对付类似的灾难。

我不打算详细分析这份报告。鉴于卡尔松先生和先前的一位发言者已阐述过意见,我将不就报告中的具体结论和建议发表评论。

我们认为,主要的一点是,该报告已经成为多方面不同工作的议题。我们希望,这将使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工作以及各会员国对《联合国宪章》所规定责任的承诺产生结果。

我们也不想分析卢旺达境内事件的起因。种族灭绝是一个悲剧,其范围极大,以致于其原因与后果都有各自的特征。这些事件不可能在其他情况中以同样的烈度再次发生——愿上帝保佑不要再发生此类事件。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份报告以及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它提供的事实准确,不仅使我们自我反省,而且还使我们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缺陷、错误和失败。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指出,几天前,我们获悉罗密欧·达赖尔中将提前退休的消息。各成员也许知道这位53岁职业军官退休的原因。我们谨对他的勇气表示称赞。遗憾的是,他的诚实和奉献态度没有从纽约得到充分的回应,而且他为防止悲剧而作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赞赏乌克兰代表就达赖尔将军所起作用所作的评论。我们一定会让他完全知道乌克兰代表所表达的情感。

我想,在这次讨论安全理事会在卢旺达问题上的失败的时候,我应该代表安理会宣布,我们已要求理

查德·霍尔布鲁克大使于下月初率领安全理事会的一个访问团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该访问团的目的是加快对《卢萨卡停火协定》的充分接受和执行,并支持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我祝愿霍尔布鲁克大使及他所率领的访问团在这一非常适时的行动中取得圆满成功。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总理先生,我要再次感谢你从加拿大返回以主持本次重要会议。我接受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已领导这一特派团,并感到高兴的是,该特派团成员已准备就绪,我认为,应该指出,先前派往科索沃的特派团将由乔杜里大使领导,这两个特派团进一步加强安全理事会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日益演变的作用:继安贾巴大使领导的去年派往东帝汶特派团的历史性工作后,安理会将不仅在通过决议方面,而且在确保这些决议得到执行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主席先生,我因此欢迎这项任务,并且相信,可以坦率地说,这一特派团将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希望:我们今后将避免召开诸如此类的另一次会议,因此今天作出宣布是非常及时的。

总理先生,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同事们努力编写这份历史性的报告。连同范瓦尔苏姆大使已经讨论过的秘书长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报告,该报告是一份出色的文件,一种引人注目的自我批评。我们可从这些文件中学到许多东西。这两份报告由联合国自己发起和编写,这证明我们集体地致力于同秘书长一起工作,以改革联合国,克服和避免过去的失败,以及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

55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了联合国,以帮助防止冲突和暴行。反对此类可怕的行动并率先作出反应是该组织——安全理事会的首要职责。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是一项世界人民最终将以此对联合国作出评价的任务。

该报告表明,正如在波斯尼亚和索马里一样,在卢旺达,国际系统失败了,这些集体的失败几乎使联合国系统崩溃。这引起了一场机构性、政治性危机,

联合国系统正试图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联合国系统将在“四大维和行动”:东帝汶、科索沃、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受到严峻的考验。

就我们而言,我国接受自己在这可怕时期的缺点。克林顿总统本人在1998年对非洲的历史性访问期间,就坦率地表示了这一点。他在访问基加利时说,

“国际社会同非洲各国一起也必须对这一悲剧承担责任。在屠杀开始后,我们没有尽快采取行动。我们本来不应该让难民营变成杀人者的避风港。我们没有立即对这些罪行下正确的定义:即种族灭绝。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帮助卢旺达建设一个没有恐惧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对克林顿总统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象卡尔松的报告和秘书长关于斯雷布雷尼的报告一样,他所说的话是对肇事者和旁观者的控告。他的这番话是呼吁采取行动,以防止种族灭绝暴力再次发生。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去年12月以我国的身分对非洲和卢旺达进行的访问中,我参观了竖在基加利外的一个山坡上的一座种族灭绝受害者纪念碑,许多幸存者陪我参观,在5年之后,他们仍然感到震惊不已。象巴尔干大屠杀场地或纳粹德国的死亡工厂或柬埔寨的杀戮场一样,参观此类纪念场所要求为死者申张正义,并且给生者带来希望。人们站在布满木头十字架的田野上,并问到联合国是否可帮助把它变成一个永久纪念馆。他们告诉我,他们估计费用将为30万美元。我希望,可设法满足这项要求,以使我们能够以具体的方式在基加利的那个山坡上承认我们必须安理厅集中注意的两项必须履行的基本责任:永远不忘记,永远不再发生。

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某种种族灭绝遗传倾向的自然结果,或者新闻记者可怕的用词“古老的种族仇恨”。这种判断是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我再说一遍,这种判断是不采取行动的借口。我在关于波斯尼亚的书中写道,我非常震惊地从美国

官员那里听到关于波斯尼亚的这些用词，总理先生，我赞扬你就这场悲剧对他们直言不讳。

卢旺达暴行是由一小撮杀人犯所干的，他们热衷于煽动仇恨以维持权力，波斯尼亚情况也是如此。这些是政治行动，这是简单明了的。干下这些勾当的人必须负责。由于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此类暴力将发生时没有采取行动予以制止，因此我们——国际社会也必须负责。

我们再次感谢卡尔松总理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这份严厉的报告。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我们希望并且是一份未来的蓝图。

这一未来现在必须是我们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在中非避免另一轮种族灭绝或其他性质的暴力是美国在大湖区政策的核心内容。这是美国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

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的影响是一个不幸的现实，必须予以处理，主席先生，这一影响将是你今天宣布的特派团的焦点。我们谦恭地、满怀希望地接受你的授权，并感到高兴的是，这么多安全理事会成员将参加这一特派团。我知道，你决定在座的每一个国家要么去科索沃，要么去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仍在最后敲定分配工作，但是，我祝贺你出色地解决了问题的这一方面，因为科索沃同样需要我们重视。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我们必须结束不受惩罚的循环。我们今天的讨论应该加强对卢旺达武装部队和帮派民兵的制裁的支持。我们还必须开始计划和准备大湖区其他武装团伙的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

美国支持卢旺达问题国际战争罪法庭。我们继续要求进行改革，以使该法庭更加有效。我们支持卢旺达本国的司法制度，这一制度有时被其他人误解。我们为大湖区司法倡议拨款 2 500 万美元，以帮助在该地区重建和加强法治。

不容否认的是，许多卢旺达杀人者仍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逍遥法外，其中许多人希望恢复种族灭绝。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不能防止其领土被这些武装团伙所利用。这完全超出其物质、后勤和政治能力范围。因此，该地区所有国家现在必须联合起来，为没有充分包括在《卢萨卡停火协定》之内的这些团伙的叛乱活动找到一项共同的解决方法。安哥拉、卢旺达、布隆迪和苏丹团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不受惩罚地活动。解决方法在于这些团伙的原籍国和经常是不情愿的东道国的国家。

我们都知道必须采取某种行动，充分执行《卢萨卡停火协定》和重新致力于司法体制，为结束目前的危机提供了最大希望。我们不能说卢旺达问题的解决仅依赖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内部的行动。我们也不能说应在不处理种族灭绝性的民兵存在于一个邻国的问题的情况下解决卢旺达的问题。卢萨卡协定的充分执行、地方和国际司法、以及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民主化与体制建设，是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和种族灭绝的关键。

我们同意荷兰代表先前表示的看法，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的人员不足，其结构不足以处理非洲危机以及东帝汶、索马里和他们的其他任务所构成的大规模挑战。然而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的维持和平委员会。我们期待着它取得成果并敦促它确立大胆的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应付正在展开的危机。安全理事会在将于 5 月 2 日开始的前往金沙萨的任务中将评估正在取得的进展程度，我们将敦促各方作更多的努力。在今后几天中，我们如何帮助刚果实现和平，将是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报告的最大致谢。

我们还谨感谢主席返回纽约主持这一重要、我希望是具有潜在历史性的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乌瓦纳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我也谨欢迎阿尔松先生，并就他向我们提交的见解清晰、富于勇气和详实的报告而感谢他和独立调查组的其他成员。

我记得，非洲统一组织在这方面也成立了一个国际知名人士小组，来分析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及有关的事件。马里荣幸地通过马里前国家元首阿马杜·图马尼·图雷将军而参加了这一工作。

我们从独立调查组的报告对联合国在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的行动的分析中所能得出的主要结论，即本组织及其会员国未能防止或制止卢旺达的种族灭绝。这一结论的根据是该报告认为缺乏分析能力，这是针对有关种族灭绝的准备工作的信息而表现出的过度和无法理解的谨慎的原因。它还谴责缺乏制止种族灭绝的政治意愿的现象，这部分是由于把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部队数量降低的 1994 年 4 月 21 日的第 912（1994）号决议，部分是由于削弱了该援助团的权限。

卡尔松先生今天的通报中长篇讨论了这些主要原因，我将不予以重复。然而，我要指出：报告除指出本组织及其会员国的弱点之外，还从卢旺达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载有很多提案和建议。今天的会议使我们得到一次有益的机会，进行公开和建设性的反省，以便能够制订各项指南，使联合国能够对各种类型的冲突做出有效反应。

我谨在这方面提出几点简要的看法。

我的第一点看法关系到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尤其是在调动资源、加强秘书处在行动规划方面的手段、对发展中国家部队的后勤支援、任务和接战规则的定义、维持和平行动与在行动地区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以及联合国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等方面的能力。

我们支持卡尔松先生早些时候提到的该报告所载的各项建议。

我的第二点看法涉及到安理会中的决策过程，在这一情况中则是安理会中不可缺少的执行各项决议的政治意愿及它与其他冲突地区相比尤其在处理有关非洲的问题时表现出的公正性的问题。成然，采取行动、尤其是防止像卢旺达出现的那种种族灭绝行为或像塞拉利昂或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情况的政治意愿，应当是明确的，不应受制于双重标准。在损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而促进国家利益的企图应当停止。

我的第三点看法关系到在危机局势中收集和理信息的系统，我们认为，必须加强联合国的早期预警能力，特别是其分析信息和对之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我们虽然欢迎已经在秘书处各级采取的各项措施，但仍必须加强联合国各机构间信息的流通，尤其是有关人权的信息的流通。

第四，对于继种族灭绝之后在卢旺达重建社会的努力。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向卢旺达提供援助和帮助，特别专注于旨在重建和实现和解与尊重人权的努力，从而实现已开始出现的希望。

第五，即最后一点，对于本组织与卢旺达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本组织应承认其在卢旺达悲剧中的一部分责任，我们欢迎秘书长决心积极争取在联合国与卢旺达之间关系中建立新的开端。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联合王国感谢加拿大安排这次公开辩论并从而接续联合王国于 12 月份在安理会成员之间引发的对卡尔松报告的讨论。

我们感谢卡尔松总理及他在调查组中的韩国和尼日利亚的同事完成了出色的工作，并感谢秘书长率先展现这种值得赞扬的透明度。

我们的讨论必须展望未来。我们各会员国和秘书处都必须准备从独立调查组的报告中了解情况、深入讨论其建议并探讨任何其他切实方法以在今后避免这种人道主义灾难。联合王国已充分准备这样做。

我们还需要考虑卢旺达人民的未来，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对其重建自己国家的努力的政治承诺和实际支持。联合王国政府致力于同卢旺达政府和人民一道努力，在一个被种族灭绝摧毁信任的社会中重建民族团结并开展主民进程。

卢旺达必须重建法制并处理灭绝种族造成的破坏性经济影响。鉴于 1994 年的背景和此前几十年的分裂和排斥统治遗产，这项任务需要时间。联合王国致力于同卢旺达开诚布公地进行合作，努力避免该进程误入歧途。例如，我们目前正在提供长期发展援助，以帮助卢旺达实现国际发展目标，我想这番话回答了马里大使提出的一个问题。卢旺达就其而言，在国家统一、廉政、解决冲突、减少贫穷和经济稳定方面都作出了具体承诺，卢旺达必须履行这些承诺。

卡尔松报告强调了涉及有关各方的一系列失败，并为今后提出若干建议。我将着重谈谈那些涉及安全理事会的问题。也许最糟糕的是，安理会在关键时刻显然未能正视实地的现实。这种失败在两个重要方面十分明显：第一，最初的任务是以《阿鲁沙和平协定》各方的承诺为依据的，但它没有适当顾及协定的脆弱性；第二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安理会未能对实地急遽变化的局势作出回应。

在信息流通、包括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情况方面显然存在实际问题。其中有些原因是结构性的。但似乎也存在一种——也许有道理——认识，即安全理事会、也许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对听取和回应不加掩饰的事实没有政治胃口。这一点很重要。安理会需要准确、及时和未加过滤的情报。同时，安理会和全体联合国会员国也必须展示政治意愿，无论该情报多么令人不快，都采取行动，处理复杂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

强调必须更加敏感和灵活并不难。在一个由 188 个平等国家组成组织中做到这一点就并非总是那么容易。但我们安理会必须明确，没有哪项维持和平任务是一成不变的，行动调整是安理会工作的一部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和责任绝不能被忽视或被抛在一边。

我们知道，为了使维持和平使命行之有效，必须有要得到维持的和平。不错，任何维持和平使命都必须以和平协定各方的承诺为基础。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找出仍存在缺陷的地方——在任何长期冲突中，这种缺陷都根深蒂固，并波及整个人口，而不是仅仅波及政治和军事角色。这项原则势必适用于大多数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塞拉利昂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维持和平行动。我们还必须准备承认政治和人道主义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种种迹象，并对此作出回应。正如报告明确表明的那样，这意味着任何维持和平行动都必须有政治分析能力和人权监督能力。另外，这也突出表明，联合国必须继续努力加强其迅速反应能力。

我们必须确保把人们从卢旺达吸取的教训贯穿于今后安理会的审议工作之中。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报告都同联合国维持和平能力和人道主义预防行动这两个更广泛的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个问题不仅对安全理事会、而且也对其它联合国机构都有影响，目前就预防冲突问题进行的讨论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讨论都详尽表明，必须采取比维持和平更加广泛的全面办法。

因此，我们赞扬秘书长打算在定于今年夏季发表的关于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的全面报告中处理这些问题。今天的讨论必须充分体现这一进程，并使安理会作出有效决定，从这个可怕情况中汲取适当教训。

利斯特雷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再次感谢你主持安全理事会今天在纽约这里举行的辩论。这表明你和你的国家致力于并支持本组织，解决人道主义问题、预防冲突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要首先表明，我们对秘书长决定对 1994 年灭绝种族期间联合国在卢旺达境内的行动进行调查深表赞赏。就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姿态。

我要特别赞扬主席先生你采取主动行动，就卡尔松总理、Sung-Joo 部长和库波拉蒂将军主持的独立

调查报告进行公开辩论。这是一份全面和客观的报告。毫无疑问，它将成为安理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它不忘过去，展望未来。

我认为，我们大家—安全理事会、整个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应无一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对我们卢旺达的错误、失败和优柔寡断进行思考。我们在思考时必须持谦恭态度并有深刻的自我批评意识。联合国没有为防止或制止卢旺达灭绝种族做任何事情，或至少做得不够。我们在卢旺达人民最需要我们时抛弃了他们。这也许是因为从军事和政治观点看我们毫无准备，但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付六年前卢旺达境内所发生事件的心理准备。

我认为，开始指责他人毫无助益，但我们必须考虑到，继这一痛苦教训后，如果我们未能在今后避免或制止灭绝种族，或在侵害人权时采取行动，世界各国人民就不会原谅我们。

卢旺达悲剧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思考三个基本相关问题：预防冲突、维持和平行动和加强保护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标准。

正如秘书长在其 1999 年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的那样：

“为了防止非暴力冲突升级成为战争，为了防止以前的战争重新爆发，主要的短期和中期战略是预防性外交、预防性部署和预防性裁军。”
(A/54/1, 第 36 段)

二十一世纪的联合国必须逐渐成为预防性措施的源头。预防性外交要求对各种事件、经济资源、以及极为重要的政治意愿进行准确评估。我们认为，1994 年卢旺达缺少的正是这些因素。

关于维持和平行动，我认为有四点十分重要。

第一，维持和平行动必须有同既定目标相符的明确实际任务，并得到必要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决定的支持。

第二，财政资源必须可靠和充足。自愿捐款可能是一个有益的工具，但绝不能取代经常会费。

第三，必须向联合国相关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提供合理的安全保障。在这方面，我们谨再次呼吁批准 1994 年《维持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并谨回顾 2000 年 2 月 9 日安全理事会有关这项议题的公开辩论所通过的主席声明 S/PRST/2000/4。

第四，在卢旺达之类的情况下，授权中必须包括有关保护平民的明确规定：当发生对平民的蓄意和严重的攻击时，联合国不能袖手旁观，它在道义上必须采取行动。分别设立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和延长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任期的安全理事会第 1270（1999）号和第 1291（2000）号决议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它们使蓝盔人员能够在特殊情况下根据《宪章》第七章保护平民。我想这就是在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学到的教训之一。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时不能让有关不偏袒的错误想法占上风。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和以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概念的广泛解释来理解人类安全的概念和加拿大提议于 4 月 19 日进行的有关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公开辩论，我们明确支持这项倡议。

在卡尔松报告之后，加强保护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标准是又一个必须研究的因素。显然，虽有某些限制，现在已有足够的规范框架。但是，事实上，在现存的这些法律标准同遵守标准之间有着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建立国家和国际打击有罪无罚现象的适当机制。正义是稳定和平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必须把犯下种族灭绝一如同在卢旺达一和其他危害人类罪行的人绳之以法。在此方面，我们支持卢旺达国际法庭的工作；我们深信，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的生效将帮助人们认识到不能容忍有罪无罚的现象。

昨天阿根廷公众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报纸《军号报》获悉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部队指挥官罗密欧·达

赖尔将军的动人讲话。在谈到 1994 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时，他说：“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因为我曾同魔鬼握手。”卢旺达的事件必须促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和分析。正如秘书长在其关于斯雷布雷尼察沦陷的报告中所说：

“联合国对停止冲突的全球承诺并不排除它作出道德判断，而是使它必须作出道德判断。”
(A/54/549, 第 506 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阿根廷代表对达赖尔将军的作用所说的非常赞赏的话。

格拉诺夫斯基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们谨表示赞同别人对你组织我们辩论的感谢之词，以便讨论对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联合国行动的独立调查报告。

俄罗斯代表团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它使我们想起在那个恐怖时期，八十万全然无辜的卢旺达人民成为被国际社会正确称为种族灭绝的一场种族冲突的受害者。我们感谢报告的作者对国际社会本来可以为防治这一可怕罪行做些什么，而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这样做，进行的痛苦分析。不幸的是，历史并不知道使用条件式，时钟也不会倒转。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罹难者不会起死回生，但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确保 1994 年在卢旺达发生的事决不再重演。

俄罗斯代表团认为，在筹备新的维持和平行动时，安全理事会应当非常仔细地考虑对 1994 年种族灭绝期间联合国在卢旺达行动的分析结果。不幸的是，世界并不完美，即便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样的权威机构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更不用说安理会单个成员国的能力了。但是，俄罗斯非常重视对保护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区内平民的规定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必须设法一方面确保维持和平人员向无辜平民提供最大的保护，另一方面避免制造联合国人员的实际能力无法实现的假象。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我们再次注意到发展国际法准则并使其适应新现实的可取之处，以便对人道主义危机作出适当的国际法律解释，并使我们能够对其作出适当反应。这正是俄罗斯总统关于在我们全球化世界的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所有法律方面进行考虑的提议的主旨。

关于卢旺达和整个大湖区目前的局势，我们当然同意报告的结论，即国际社会需要协助卢旺达人处理种族灭绝的后果并惩罚凶手。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最终停止暴力的循环，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就是其中的一环。换言之，我们呼吁大湖区冲突中的各方放下武器，加紧寻找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法，这将最终在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范畴内全面解决该地区的局势。

穆罕默德·卡迈勒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公开通报会，讨论对 1994 年种族灭绝期间联合国在卢旺达行动的独立调查报告。早就应当正式审议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了。长期以来，本组织怯于承认其在处理卢旺达局势时的一个严重判断错误。今天，1994 年屠杀八十万人民的余波犹存，为了让我们洗清这一可怕的过失，我们必须鼓起勇气，非常谦卑地接受并承认我们的缺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悲剧中吸取教训，不让卢旺达事件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重演。

在这方面，我们也谨向瑞典前首相英瓦尔·卡尔松先生表示赞赏，他提出了严肃、批评性的报告，令人痛苦地罗列了联合国如何无视即将发生屠杀的大量警讯并在屠杀开始时撤出多数维持和平部队的细节。

我们也要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授权提出该报告的决定以及公开表明他的深切遗憾和承认责任的勇气。马来西亚认为，让真相大白符合本组织的利益。我们必须恢复本组织的信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促进卢旺达人民医治创伤与和解的进程。

除了叙述实际发生的情况之外，独立调查组发表报告的时机也是值得注意的。它在 1999 年 12 月 16 日的发表正好是在一份同样至关重要的内部报告之后，后者详细说明 1995 年 7 月联合国如何让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安全区受到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蹂躏。这些调查一起确立了联合国坦诚的一种令人钦佩的新标准。它们可以指明今后出现类似局势时采取更加有效的国际行动的方向。

我们只有对自己坦诚，并且清楚地了解迄今所做错的事，才能够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努力确定一套明确的标准和指导方针，以便指导今后更好地执行和协调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一系列活动。

该报告清楚地把授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的原先任务受到限制的责任归于其所属者。很显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的依据是不充分和有缺点的分析，安理会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即组成援助团的部队少于实地特派团认为必要的数目。联卢援助团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小心翼翼的；在实地执行的过程中也变得同样小心翼翼。执行任务的方式在项传统的维持和平任务之下是可以维持联卢援助团的中立作用——但这完全不足以制止种族灭绝。这就是被认为得到安全理事会支持的行动的范围。虽然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这本应促使联合国发挥更加强有力和预防性的作用，但是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调整这项任务，以适应实地局势的现实情况。

安理会成员也必须分担责任——显然，有些要承担大一点的责任。当时没有意愿部署一支更强大的部队或使用“所有必要的手段”来保护处在危险之中的平民。从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有足够的训练有素、得到装备和支助的部队就可以避免恐怖的悲剧。

人们经常说，联卢援助团是在索马里阴影下建立的一项行动。特别是，1993 年联合国在索马里的维持和平人员的悲惨死亡对于人们对展开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索马里的经历似乎对秘书

处产生了限制性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持和平行动过程中所能设想的危险方面，以及在解释任务方面。尽管如此，虽然可以对联卢援助团部队的错误和能力受到了限制提出批评，但是应当由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来承担责任，因为它们没有准备好向卢旺达派出任何部队或提供物资。

我国代表团欢迎授权提出、发表和讨论该报告。该报告清楚地表明围绕着吞噬卢旺达的悲剧的各种情况，这对本组织会员国是极为有益的。然而，独立调查组本应解决的许多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这些问题涉及谋杀行动的肇事者和可能的同犯的身份，这次谋杀行动夺去了卢旺达和布隆迪国家元首的生命。正如该报告在许多部分中所指出的，这次攻击行动是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催化剂。我们注意到，报告的证据仅从冲突的一方收集而来，这就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爱国阵线）及其合作者。如能同流亡的其他人士进行相似的访谈，本可证明是有益的。这些流亡者包括哈比亚里马纳总统被暗杀之前的连续两届过渡政府的成员，以及不得不逃离国家的第一届爱国阵线政府的成员。

我们认为，独立调查组若是在其建议中包括就卢旺达种族灭绝设立一个更加全面和详尽的调查委员会，或许那应是有益的。我们认为，卢旺达人不仅为 1994 年被屠杀的图西人和温和的胡图人，而且为在这一时期前后被各方的极端主义分子所屠杀的其他胡图人和图西人而感到悲痛。这种调查，虽然是令人痛苦的，将有助于结束这一巨大的悲剧，从而促进两个种族群体之间的必要的和解进程，而这对该区域今后的和平与安定是重要的。

我们注意到，本组织在 1994 年的悲剧之后承认，它确实从卢旺达吸取了一些教训。它没有对种族灭绝近在眉睫的若干警告作出反应。比如，在大屠杀之前的六个月，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一项报告预示即将发生的情况，但是该报告从来就没有到达有可能对之采取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部的高级维持和平官员的桌上。秘书处内部以及与安全理事会的无法

沟通现在是比较不可能了。然而，更好的内部沟通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联合国对危机作出反应的能力大小只能取决于提供必要资源的其主要成员的意愿。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防止卢旺达的大屠杀已经导致许多人怀疑它在决定干预冲突局势时为人们所目睹的选择性。

联合国也许无法全部应付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道主义挑战。但是，在新的千年前夕发表的独立调查组的这一报告应当成为本组织的一个转折点。本组织在必要的时候，在民众所在的任何地方，必须对处在危险之中的民众发挥自己的作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耻辱在于：联合国在该城镇驻扎一支象征性的维持和平部队，只够用来宣称它关心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命运，而不足以向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同样，卢旺达大屠杀的耻辱在于：联合国是向该地区派遣了一支象征性的部队，但是，在恐怖出现的时候，这支部队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吸取这次悲剧的教训，正视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过错。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该报告的 14 项建议，如果予以执行，这些建议将确保在卢旺达犯下的悲剧性错误不会重演。我们必须感谢报告的作者公正地把话说出来。

杰兰迪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我也想感谢你，主席先生和整个加拿大代表团组织这个公开情况介绍会。同时，我想感谢英瓦尔·卡尔松先生关于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期间联合国的行动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的有用发言。我赞扬该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这种工作导致这份非常重要和有历史价值的报告。

我们想对秘书长致敬，因为他值得赞赏地把查请本组织在卢旺达种族灭绝屠杀问题上的行为的有关事实的任务交给调查委员会，以使整个国际社会、联合国和会员国能够吸取教训以在今后防止此类悲剧。

六年前，卢旺达人民遭受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灾难：80 万人遭到屠杀。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没有防止这场种族灭绝屠杀，也没有及时阻止它。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揭示了卢旺达历史的这个黑

暗时期的实况和国际社会在这场悲剧期间未能阻止它的事实。该报告将不可避免地加强认识并将成为就如何预见和防止此类悲剧进行深入反省的基础。

独立调查委员会作出的一系列结论和建议，值得联合国会员国，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给予充分注意。在今后出现维持和平的挑战时，这些无疑将作为作决定的基点。

今天的审查决不减损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成员，包括突尼斯蓝盔人员的英勇、勇气和责任感，后者根据突尼斯政府的指示在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可怕的几周中坚守岗位。独立调查团报告提到这一点，并予以赞扬。

象独立调查团指出的那样，最近几年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强联合国对冲突作出反应的能力，并避免在卢旺达犯的错误的。但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加强联合国防止今后灾难的能力。这项努力要获得成功，国际社会的政治意志和充分支持是不可缺少的。

王英凡先生（中国）：我们感谢加拿大代表团安排本次会议，也感谢卡尔松先生的情况介绍。独立调查委员会为总结联合国在卢旺达大屠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富有成果的努力。我们对委员会认真、细致的工作表示赞赏。

国际社会未能有效阻止六年前在卢旺达发生的悲剧，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令人深思的，相信今天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总结教训，有效改进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增强安理会今后对类似危机的反应及处理能力。

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建议，它们涉及不同领域，也关系到联合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涉及到联合国的改革，涉及到提高安理会的效率，涉及到如何提高成员国的政治意愿，涉及到如何组织足够的资源。总之涉及到许多问题，值得联合国有关部门重视和研究。特别是结合联合国在 21 世纪的作用，全面地予以考虑。

我们注意到，联合国近年来正努力改进维和行动
的效能和效率，如何切实有效地开展在刚果（金）、
塞拉利昂等地的维和行动，把对非洲问题的重视落到
实处，最大程度地争取成功和减少失误，已经引起人
们的关注。相信通过对卢旺达问题教训的总结会对此
有所启迪。

莱维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想欢
迎卡尔松先生并感谢他提出今天在安理会面前的报
告。该报告描述了 1994 年 4 月和 7 月之间犯下的种
族灭绝大屠杀的恐怖。

“卢旺达人杀卢旺达人，残忍地对该国的图西人
口斩尽杀绝，但同时也杀害政治态度温和的胡图
人。民兵和武装部队犯下了可怕的暴行，但平民
也对其他平民施暴。

“国际社会没有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也没有在
屠杀开始时阻止屠杀。”（S/1999/1257，附件，
第 2 页）

主席先生，你所组织的辩论提供了一个让我们思
考所得到的经验教训的机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
需要确保联合国在面对这种悲剧时不再无所作为或
无能为力。

但我首先想欢迎秘书长所采取的行动。他有勇气
地授权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 1994 年种族灭绝大屠杀
期间联合国的行动。我们支持这项行动。法国外交部
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先生在去年 11 月会见独立调查
委员会成员时说，法国也同样决心实现透明度和有效
性。在法国，这种决心表现在 1998 年成立了一个议
会卢旺达问题调查团。让我们也共同拿出面对事实
的勇气。

联合国在执行它的使命方面严重失败。独立调查
委员会的报告透彻分析了导致联合国在卢旺达的失
败的那些错误。报告突出强调了在种族灭绝屠杀爆发
前所作的决定的缺点：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
助团）的任务规定的不充分；为援助团提供的资金不

足；对资料的利用不充分；以及未能使援助团的任务
适合当地局势的要求。

报告还强调由于“未对种族灭绝作出反应”（同
上，第 38 页）、缺乏加强联卢援助团的决心、未能理
解事件的真正性质以及未能决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所造成的严重错误。

当然，如调查者所说，1994 年情况特别紧张。联
合国在全世界部署了约 7 万名蓝盔人员，好几个特派
团正面临困难。这些因素的确影响了决策。我们还应
该赞扬联卢援助团部队的比利时部队，尤其是加纳和
突尼斯的部队，他们留在实地，尽他们所能保护受到
威胁的平民。

但是，总的情况是失败的情况。联合国未能帮助
卢旺达人。如调查团所强调，我们大家——安全理事
会成员、秘书处、联合国各会员国——都对此负有重
责。

在对联合国对卢旺达行动进行它自己的调查之
前，法国国民议会设立了关于卢旺达问题的议会实况
调查团。调查团由基莱斯先生主持，在整个 1998 年
从该悲剧的许多参与者和目击者收集证词。本着透明
度的精神，公布了所有这些材料。这一工作使人们能
更好地理解卢旺达悲剧的若干方面。卡尔松先生的调
查团补充了这些分析。

从法国议会的报告中，我注意到法国在 1994 年
事件之前曾作出努力避免军事解决和鼓励各当事方
分享卢旺达政权。我们需要将这一悲剧放在其历史背
景中来看，从 1990 年卢旺达爱国阵线所发起的进攻
可一直追溯到 1959 年非殖民化时的各个事件。法国
对 1993 年 8 月在阿鲁沙结束的谈判的积极支持表明
了这项政策。所达成的协定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
中持久和平本来可在各方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得到确
立。

议会报告还显示，法国在注意到对抗的风险的同
时却低估了极端主义的增长。但是，它试图通过联合

国动员国际社会防止一场屠杀。卡尔松先生的分析表明当时在场的其他会员国或秘书处都没有更好地利用后来证明是关键的资料。这一态度大大有助于说明联合国未能防止 1994 年的种族灭绝。这场悲剧在有关引发种族灭绝因素的领域仍然是不清楚的，尽管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这点会得到澄清。

面对 1994 年春的种族灭绝并鉴于加强联卢援助团所遇到的拖延和困难，6 月，法国在非洲国家部队的支持下援助了受到威胁的人民。它这样做是具有透明度的，并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授权。我们知道出现了对绿松石行动的批评，我们认为批评是没有道理的。难道我们应该再次袖手旁观吗？卡尔松先生提出的报告反映了这一批评的一些方面，但是报告也说“很多与谈话的人称赞绿松石行动在几乎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的情况下拯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同上，第 53 页）这是我们对该次干预保留的一点。

现在我们需要从这场悲剧吸取教训。对于大湖地区以及安理会的工作和总的维持和平行动可作出若干评论。

卢旺达悲剧是在一个尤其不稳定的环境中发生的。我们尤其忆及在普遍消极气氛中 1993 年 10 月在布隆迪发生的屠杀。自 1994 年以来，大湖地区的这种不稳定增加了。在未能处理卢旺达种族灭绝之后，联合国未能正视随后发生的各个危机。

1994 年之后的几个月中，安理会未能及时对扎伊尔东部的难民营中武装分子的驻留所造成的问题作出反应。

1996 年秋，基伍危机促使安理会，除其他外，在法国敦请下授权派出一支多国人道主义部队。加拿大宣布它准备率领该行动。法国说它愿意参加。安理会中的不一致意见最终意味着不得不放弃该行动。在面对新的屠杀时——其规模未得到充分衡量——国际社会再次保持无所作为。

到 1998 年 8 月止，安理会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场战争。我们收到的资料报道了对平民百姓的暴

力，尤其是在该国的东部，它证明了局势的严重性。这次我们是否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呢？

从 1994 年开始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卢旺达种族灭绝造成的情况的一部分。在我们现在审议卡尔松先生的报告时，我们必须对联合国在大湖地区的工作做出结论。

让我们先看一下卢旺达。卡尔松先生的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重建、和解和遵守人权。我们还应补充说，也要在司法方面给予帮助，这对实现这些目标是必不可少的。法国支持这一呼吁。我们同欧盟伙伴一起参加这一努力。秘书长提议卢旺达同联合国发生新的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双方的努力将使这方面能取得进展，并希望为换取认真的安全保障，卢旺达将朝着和平民主前进，以恢复区域稳定。这肯定是国际社会关切的事项。

的确，联合国在整个大湖地区的行动应更加持续。安理会已授权部署第二阶段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我们必须确保这一行动取得必要的手段，尤其是必要的资金。安理会成员对每一个交战方不偏不倚的行动以使他们履行其承诺，对支持 1999 年 7 月的卢萨卡协定也是必要的，该协定的所有内容都应实施。

安理会前往该领土的下一个特派团是发出我们所有信息的一个机会。但是切实部署第二阶段联刚特派团才会证明国际社会有意愿作出全面贡献实现该国和大湖地区的和平。

在这里回顾布隆迪局势也许是有益的。安理会支持曼德拉总统领导的调停进程和布隆迪各方的努力。这一进程是困难的。现在对该国的制裁即然已经取消，为了加强这一里程，国际社会就必须迅速恢复对该国人民必要的经济援助以有助于这一进程。

在大湖地区以外，我们必须考虑加紧联合国在危机局势中采取行动的办。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一项反对灭绝种族的行动计划、改善联合国部署能力、

保护平民等等。我们欢迎这一趋势，这有利于在联合国内改善信息流通并有利于提高对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秘书长请以布拉希米先生为主席的小组提出的报告将使我们能对这一局势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现在谈谈安理会的工作，需要说明两点。

首先，在安排新的行动时，安理会的决定应有更好的准备。秘书处提供的住处应按照尚待确定的办法由其他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予以补充，以便我们能更好了解当时的局势。

我们还必须改善安理会对联合国特派团的后续工作。经验表明一旦在实地部署特派团，安理会有时并未足够认真地对执行其授权采取后续行动。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正规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工作重点重新放在危机局势和联合国行动上。我们应花更多时间考虑这一局势，少花些时间考虑所谓专题。

我们的目标应是使安理会能更好地评估实地特派团面临的风险并据此修改他们的授权和手段。

在暴力和屠杀平民面前，安理会的决定以及还有军队派出国的决定会总是特别困难的。当要联合国作出承诺的时候到来时，我们是否会足够注意对 1994 年卢旺达事件调查取得的教训？我们肯定希望如此；否则，我们将对不起受害者的在天之灵。

安理会对去年 9 月东帝汶暴力的态度是个令人鼓舞的迹象。部署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多国部队使我们能够制止暴力。安理会在很短时间里作出这一决定。

但是我们也能想起安理会没有采取必要行动制止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其他局势。安理会在得到应有的信息之后，是否仍然会有分歧而不采取行动？我们不认为这样。

在去年 9 月最近一届大会开幕时，秘书长向国际社会呼吁考虑联合国怎样才能对这些局势迅速而有效的干预。发动了一场辩论，我们需要继续这一辩论以使安理会能充分发挥《宪章》赋予它的作用并在今

后避免诸如全世界在近几十年来看到的人道主义悲剧。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组织这次会议。我们赞扬秘书长决定任命一个独立调查团调查联合国在 1994 年卢旺达灭绝种族中的行动。我还要感谢卡尔松总理和他的工作班子为执行其任务所作的广泛工作。

我们大家都曾看到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中的骇人听闻事件。无辜的卢旺达人被其邻居和朋友残酷屠杀。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卢旺达人。

报告显然认为国际社会对完全缺乏防止卢旺达人间悲剧的政治意愿应负责任。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不能对这场悲剧作出反应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现在应该为了全人类而一起努力确保我们决不允许灭绝种族在任何地方重演。

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是值得赞扬的。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法庭，并希望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所有肇事者将被绳之以法。纳米比亚将继续同该法庭合作，而且我们呼吁其他国家将所有被指控的人送交该法庭。

调查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是中肯的，应在处理世界各地危机局势中予以考虑。因此我不一一谈论这些意见和建议而只强调突出的几点。

首先，国际社会必须集中资源解决冲突的根源，首先积极主动预防冲突的发生。

第二，会员国需要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及时充分解决冲突，不管它们发生在哪里。

第三，我们必须强调再强调让每一次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都配有适当的权限和足够的人力和物资资源的必要性。维持和平确实代价昂贵，但和平的得来本来就是不便宜的。在考虑维持和平行动时，会员国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部队的数量和任务的代价。

因此我谈到第四点，即每次行动都要有充分的规划，做好必要技术和政治考虑。这对任何维持和平行

动的成功都至关重要。而且需要不断的评估、监测和支助,进行调整,以确保有效地应付当地的实际局势。

第五,保护面临威胁的平民应该是维持和平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卢旺达的教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高兴,下星期我们将讨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问题”。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尽管有卢旺达的教训,报告中指出曾造成 1994 年未在卢旺达采取行动的一些有问题的措施,如今在联合国考虑对某些冲突局势采取行动时,还在采用。

秘书长有关拟定一项行动计划以防止种族灭绝的建议最受欢迎。我们期待收到这份计划,而且我们无疑它将非常有助于定于 2001 年举行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问题世界会议。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卢旺达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努力。我们支持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协助,特别重视、真正的民族和解和尊重人权的呼吁。

最后,我要向达赖尔将军表示特别敬意,赞扬联卢援助团和各署和各机构中的联合国人员,正如报告中所述他们在那一困难的时候,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作了极大的努力,救下了许多平民、政治领导人和联合国工作人员的生命。这些勇敢男女的努力值得肯定。

我们都没有对卢旺达人民尽责。让我们汲取过去的错误和失败的教训,拿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使这个世界成为全人类生活的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纳米比亚代表对达赖尔将军和在当地执行任务并已作出如此伟大努力的联合国其他人员的赞扬。

阿赫迈德先生 (孟加拉国) (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们同安理会其他成员一起,由衷地赞扬和感谢今天参加我们会议的英瓦尔·卡尔松总理和他在卢旺达问题调查委员会上的同事们向我们提供了一

份极端宝贵的报告。这份报告是一份历史性文献,它确定了本世界组织及其不同机构、整个国际社会的个别成员国以及参与种族灭绝的卢旺达人的行为责任,而且做的客观,完全透明。

我们赞扬加拿大主席和你领导主动倡议,让我们在安全理事会正式会议上面对这些现实和责任。我们确实赞成应强调应从卢旺达悲剧中吸取哪些教训。我们在决策进程中应考虑到卢旺达经验,以便我们今后不犯这么可怕的错误。

卡尔松先生的报告对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它毫不犹豫地指明责任何在。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必须吸取教训。我们应该最诚恳和最清楚地表达我们的同情和我们集体失职的认识。

去年 12 月,秘书长承认在卢旺达的过失,并代表联合国表达了他深切悔恨。建立联合国就是为了欲免后世再遭战争的祸害。直接提到的是上两次世界大战。当时可能认为内战是过去的事情,因此根本没有预见。但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却发生了。约 80 万卢旺达人被他们的本国同胞杀害,而且屠杀是两族之间进行。

明显的结论是,1994 年发生的卢旺达的悲剧原本不该发生。它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纪,特别是在联合国成立后。第二个结论是,这场种族灭绝是可以防止的。第三个结论是,未能防止是因为国际体制没能这样防止,这一失败极其严重,造成卢旺达损失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国际社会未能防止卢旺达种族灭绝,但它不能不对卢旺达的社会经济发展尽它的责任。

表明我们悔恨的最好办法,保证我们对错误或失败的认识的最好办法应该是能在今后采取正确的行动。那将是我们最有力的道歉,是我们能对在卢旺达被害的成千上万人类同胞表达的最大敬意。

达兰特小姐 (牙买加) (以英语发言): 首先让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起感谢你主持今天有关卢旺达

局势的公开通报。我国代表团要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的历史性倡议，建立一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 1994 年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联合国的行动。我们也要感谢卡尔松总理调查委员会其他成员彻底完成他们所接受的任务。他们在卡尔松先生今天提出的报告所作的分析和结论更加令人深省，因为它们指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1994 年发生在卢旺达的可怕事件几乎肯定是可以被防止的。

在这一反省的过程中，我们要寻求的不是责怪谁，而是要弄清使得这场种族灭绝得以泛滥成灾的各种事件和制度缺陷，以便找到办法，保证同样的暴行今后永远不再发生。

鉴于这次辩论是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这个机构如何制定可以用于预防冲突的预防性措施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拿出政治意愿来加强其预防冲突的能力。我们必须做到积极主动，而不是等大批人丧生后再采取行动。

可以理解的是，冲突的许多原因——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原因——必须由整个国际社会处理。然而，安全理事会仍然有责任防止危害和平的行为。我们不能放弃这一责任。随着发生诸如在卢旺达和巴尔干所发生的以及今天正在非洲许多地区发生的种种危机，安全理事会的信誉不断受到质疑。因此，我们支持卡尔松所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且将与安全理事会成员一道努力，从接受建议转到采取行动。不这样做将意味着 80 万卢旺达男女和儿童死得枉然。

卡尔松的报告清楚说明了一些事实。在 100 天左右的时间里竟有大约 80 万人在未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情况下遭到屠杀，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卢旺达图西族人遭到了残酷和野蛮的种族灭绝。人们对于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没有采取决定性行动来防止二十世纪的重大悲剧之一提出了许多理由。它们已被归结为会员国一直没有政治意愿去采取行动或者以足够力度采取行动。一个重大的失误也许是未能认识到或确认那些能

预示即将发生灾难的种种迹象，或就有效的对应行动进行规划。

我国代表团认为，今后在维持和平行动的关键规划阶段必须保持高度谨慎。因此，我要谈谈报告中的一项建议，该建议的目的在于提高联合国从事维持和平行动的能力。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其原因是：任务规划不周、没有执行这一任务的必要资源以及安全理事会成员在政治上没有意愿在实地部队不能受到无端拖延的时候作出重大的决定。我们要借此机会向维持和平人员和人道主义救济人员致敬，他们即使在国际社会视而不见的时候仍然努力为和平事业而工作。

我国代表团要指出，今后的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包含两个关键要素。首先，在规划维持和平行动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情况的快速变化。最起码必须能够在实地局势清楚要求重新评估该行动的时候，迅速增派部队，以扩充部队的力量。由于政治或财政上的眼前顾虑而部署最少量部队的做法并没有考虑到部队部署到实地后可能遇到的许多可变因素。我们不能在不对意外局势留有必要回旋余地的情况下继续派出部队。

第二，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规定必须反映实地的现实，同时也必须有执行这些任务的政治意愿和物质手段。此外还必须与冲突各方密切协作，以制定任务。虽然只有安全理事会才有合法权力授权部署部队并确定任务，但是必须确立一个机制，使部队指挥官有必要的灵活性来决定其最佳行动方针，并且能够将其决定迅速通报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委员会关于保护平民的建议。这一点必须在今后所有维持和平任务中有所规定。

此外，部队部署之后，它们必须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指挥。各国不应在未与中央权力机构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撤出本国特遣队。

我国代表团还赞同委员会的建议：秘书长和会员国应利用千年首脑会议和千年大会的机会，调动政治

意愿，明确应付联合国维持和平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卜拉希米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安全理事会在事件发生后采取了行动，设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便将卢旺达灭绝种族罪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此。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系统、甚至整个国际社会在道义上都有责任确保我们确实有意愿防止再次发生种族灭绝。今天也许标志着我们采取了头一步。在卢旺达努力重建本国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并争取民族和解的时候，它将继续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

我们不能再一次辜负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加拿大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著名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经说过，政治的首要任务是避免发生“极度的痛苦”。令人痛苦的是，这一至理名言无人理会。这在卢旺达问题上最为严重。该国的灭绝种族行为极端残酷地暴露了人性中的持久、黑暗的一面以及猜疑、破坏、仇恨和放纵暴力的现实。

我想，这个会议厅里的每一个人在回顾那段时间时，都不会不后悔，也不会不对我们没有在卢旺达人民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而感到十分悲伤。灭绝种族行为的极端残暴性再次成了对“绝不再”的承诺的一种讥讽。

对联合国来说，卢旺达的悲剧几乎使人们完全丧失了对我们实现联合国创立宗旨的能力的信心。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在实地的驻留使当地平民认为他们将不会遭受暴力。这种对联合国的信任最后没能兑现，这对于支持《宪章》基本原则和理想的所有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和失望。

那些头带贝雷帽的士兵要求得到支持的呼声被故意忽略，但是，他们仍设法挽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这令我们感到骄傲和鼓舞。

（以法语发言）

一位维持和平人员，也就是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的加拿大籍指挥官罗密欧·达赖尔中将在本星期宣布他退休。他的说法很简单：“我是因卢旺达问题而伤亡的人——是一名受伤的军官”。他在人们无法想象的情况中所表现出的高尚道德、远见、敏锐目光和领导才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以英语发言）

我知道，许多坐在安理会会议桌旁的人对他以及在实地工作的所有人所做的工作表达的慷慨赞誉将大大有助于愈合这一经历所造成的一些创伤。

正如我们今天上午所听到的，调查联合国在1994年卢旺达发生灭绝种族事件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具体地列举了各种失误、重大错误和缺点。该报告还吸取了我们必须密切重视的教训。

我们非常感激卡尔松总理和他的同事们做了这项工作。象许多成员一样，我要赞扬秘书长安南确保我们并没有忘记以及公开地承认本组织在这场悲剧中的失败。

安理会必须为这场悲剧承担自己的责任。现在悼念受害者的最好方法是坚定地承诺永远不拒绝同情和帮助遭受武装冲突之苦的平民，而是在口头和行动上全神贯注地保护他们。

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表明需要做些什么。第一，有罪无罚文化必须停止。现在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日益增强的国际共识：应该对那些灭绝种族、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负责的人绳之以法。安理会设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法庭推动了这项工作。《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通过是至今对这一共识的最明确的表达。安理会成员负有特别的责任确保，《法院规约》迅速得到批准，并确保该规约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将对未来虐待行为的重要威慑因素。让这一信息毫不含糊并被明确地理解：违反者将被追究、起诉和惩罚。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表明，必须改善信息流通。报告还表明，安理会必须加强其分析和监测动荡不安

局势的能力，必须改善联合国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尤其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各部门之间。为此目的，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努力制订一项着重于预防和准备的协调框架。

安全理事会需要继续扩大其对话者范围和信息来源。其渠道越是多种多样，安理会听到即将发生的危险的信号的机会就越大。

安理会没有必要害怕允许早期地、经常地和公开地听到受苦受难和被压迫者的声音。这并不损害安理会的合法性和其采取行动的能力。恰恰相反，这有助于加强安理会。

迅速和果断的反应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提供部队以帮助保护平民的要求日益增加时，联合国本身管理各种复杂的特派团的能力承受相当大的压力。

加强联合国待命安排，包括快速部署特派团总部努力，对扭转这一趋势是至关重要的。以协调一致的、综合的方法来确定、调动和投入必要的军事和民事资源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非常坦率地说，执行这些前瞻性方法的努力不够。

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站在第一线，只是授权和平行动是不够的；安理会更加积极地参与这项工作的时候到了：即确保有能力迅速地有效地执行这些任务。

安全理事会还需要确保联合国的行动得到充分的资金、必要的资源、适当的强有力授权和明确的接战规则，以执行交给它们的各项任务。

有迹象表明，安理会正注意这一点。驻塞拉利昂、中非共和国和东帝汶特派团具有授权和人事承诺，以适当地保护人民和处理当地的现实。但是，安理会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反应显示，仍有改进的余地。

所有这些措施，如果得到贯彻，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加强人的安全以及有助于防止人道主义灾难。

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就不能肯定，诸如在卢旺达发生的最严重的虐待行为将不再一次发生。确实，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预防性努力不会总是成功。急剧上升到人类痛苦的极端行动不总是受到控制。

在这些十分特殊的局势中，保护平民要求加强我们在必要时以武力进行干预的意向，让我在这一点上说得清楚。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要求进行军事干预：种族灭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大规模和有系统的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行为，从而造成广泛的痛苦和生命损失。我们所考虑到的考验是非常困难的。最低限度是非常高的。

干预的目标并不是威胁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是结束广泛的痛苦，确实，只有当那些控制国家的人不能、或者极不情愿履行这一基本的、根本的义务时，才可以考虑进行外部干预以保护人民。

我们认为，对动用武力以减轻极端痛苦以及安理会在此类行动中的作用的任何讨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第一是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日益重要性，反对有罪无罚现象的全球趋势、以及安理会自己所开创的先例均证明有正当的理由采取行动，有越来越多的习惯法开始确立必须得到承认的新的人道主义标准。

第二，我们必须考虑行动指导方针。一旦确定真正或预计发生的暴力符合检验标准，还有其他因素指导作出一项干预或不干预的决定，包括是否最后已经来不及采取其他和平手段解决威胁；是否有这样一种危险：即这种威胁如果听之任之，将危及区域或国际安全；以及是否不能在所有地方进行干预意味着我们绝不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

第三，必须有一个行动框架。该框架应该允许制止大规模的、有系统的违反行为，但是必须有强有力的保障措施加以明确的平衡，以确保该框架不被滥用。为此目的，我们需要确保：危机的严重性得到充分的证实；军事武力能够并且将有助于结束广泛的痛

苦和生命损失；部署的兵力与情况相符；使用武力是多边的、并且得到广泛的支持；以及这是建设和维持和平的更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许多人暗示，这是一场安理会仍未准备好的辩论。然而，这是一场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避免进行的讨论，并且我们越快进行，就越好。对卢旺达灭绝种族受害者，对其他受到极端虐待的人，对所有人的安全和本组织的信誉来说，不采取行动的代价真是太高了。

也许，假如我们早一点处理这一非常困难的议题，并且努力就此达成某种共同的一致意见，我们本来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避免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或在该事件一旦发生予以制止。第二次机会是少见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机会。也许，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制订一项防止种族灭绝的联合国系统行动计划，我要把所有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增加到这项计划中去。正如牙买加代表所说，千年大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并且正如秘书长所建议的，“重新确定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的中心地位。”（A/59/2000，第210段）

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悲惨的；它也是充满希望的。菲利普·古雷维奇在他所写的一本非常生动的、富有戏剧性的书中告诉我们：在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的一群年轻的、手无寸铁的胡图女孩拒绝离开她们的图西朋友，即便灭绝种族者命令他们这样做。她们可选择不要遭受这种痛苦，但是她们选择留下来，并付出了最高的代价：她们的生命。在那所修女学校的这些年轻妇女的勇气和牺牲应该是对坐在这个会议桌旁和所有地方的人的指南和鼓励，因为我们也能够这样做。

制订一项联合国行动计划以保护人民免遭最骇人听闻的虐待行为以及最严重的侵犯者的伤害，对过去的受害者来说将是太晚了，但是希望对我们和后代来说不太晚。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下一位发言者是卢旺达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穆塔博巴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让我就一个对我国和对整个联合国大家庭来说极为重要的议题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今天举行这一关于卡尔松报告的公开辩论，差不多是在该报告发表4个月以后。我还要感谢和祝贺你尊敬的前任，他们领导安理会进行了明智的审议。我们希望向你们大家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我们衷心感谢所有成员的发言，及他们对我们和那些死去者——特别是那些因奋力挽救生命而勇敢牺牲者所表示的遗憾、同情和支持的话。

卢旺达政府和人民谨感谢科菲·安南先生阁下代表本组织委托拟订这样一份富有勇气的报告；我们向他表示祝贺。联合国、全世界和卢旺达都应感谢和赞赏前总理英瓦尔·卡尔松和他的小组，该小组由韩升洲先生和鲁弗斯·莫杜普·库波拉蒂中将组成，由埃利诺·哈马舍尔德女士和李新禾先生协助，他们在编纂今天的所谓卡尔松报告中进行了艰苦和全面的工作。该报告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在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一个具体时期中本应当或不当发生但却发生或未发生的情况，而当时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就驻在我国的当地。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段都载有出了什么差错、何时、如何以及——迟疑地——为什么出了差错的细节。

我们此时不应长谈过去，而应清楚地表明下一步怎么办并保持势头。全世界和卢旺达目前正等待着安全理事会各成员的声音；我们已听到了他们的发言，并因此感谢他们，但下一步是什么？卢旺达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坚定和关切的成员，希望听到安理会全体成员有关该机构已经或打算采取的政策与措施的论述，以确保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所目睹的、不幸发生在卢旺达的事件，永远不会在世界其它地区再出现。毫无疑问，该报告表明全世界有负于卢旺达。卢旺达政府和卢旺达人民感谢那些因有负于卢旺达而代表其人民和政府诚心诚意道歉的人。我知道这并非易事；这是一种意在使我们同不幸的过去和解的勇敢姿态。

我还谨重申：我们真诚感谢那些在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的人；那些困难的时刻尚未过去。

每一个卢旺达人——实际上卢旺达的每一个朋友——都以某种方式成为所发生事件的受害者。卢旺达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正惨痛地经历身体、心理和创伤后的苦难。卢旺达政府为了平息他们的呼号而耗尽心血，但却由于问题的极大规模及它所掌握的微薄能力而徒劳无益。卡尔松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值得重新检查，以确保任何这种情况都不会再发生。此外，第 13 和 14 项建议特别呼吁所有国家作为单独的会员国采取迟来的行动，以便种族灭绝受害者、包括最悲惨和最绝望的幸存者能够感觉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转变之风。正如很多成员在这座建筑物的走廊里个别地正确指出的那样，卢旺达需要一项独特的“小型马歇计划”。可能再次使世界震惊——但却是通过最终采取某种极为积极的行动。所有成员可作为单独的国家、也可作为国际社会这样做。

改正错误或重修旧好永远不会太晚。国际社会所辜负的卢旺达人民享有生命的权利，失去了上帝的最大赏赐。我认为他们也在聆听我们今天正在这里所讲的话；我们向他们表示致意。该国及幸存者失去了他们为之努力和生活的一切。我在这里代表他们所有人。他们也有享受正义、复兴、复原、重返社会和真正和解的权利，这是各单独成员和其他人、安理会各理事国及本组织其它会员国的共同补偿努力的一部分。我们也有各种关注。卡尔松报告是各位成员的报告。它们对其采取的行动，关系到整个世界和受害者。如果卢旺达政府和卢旺达人民能够协助各位成员更好地帮助他们，我要重申我们在急需立即采取行动之处予以充分支持与合作。

报告明显地要求国际社会拿出良知，援引 1948

年《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缔约国的责任。不愿承认当时在卢旺达进行的种族灭绝，不外乎表现出强国不愿履行这一责任。事实上，很多那些策划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者今天仍逍遥法外。在卢旺达为重建而奋斗之际，确实应把今天未出席我们会议的秘书长的话作为行动的基础：

“在我作为秘书长的所有目标中，我最深刻承诺的莫过于使联合国能够在保护平民免受种族灭绝或大规模屠杀方面永远不会再失败”。（第 SG/SM/7263 号新闻稿，1999 年 12 月 16 日）

这不仅应当是秘书长的阐述，而且应当是安全理事会及我们所有人的阐述。

我们希望，达赖尔将军和种族灭绝的幸存者们这样将有可能会重返上帝的怀抱并与其他英雄和好；即我们当中那些同卢旺达享有长期伙伴关系者，从而重建该国并恢复被严重摧残的卢旺达社会结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卡尔松先生发言。

卡尔松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认为卢旺达代表刚才所作的发言应是这次辩论中的最后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没有人再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处理此案。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